

# 常識

[美] 潘恩著

商 务 印 書 館

3260

# 常識

〔美〕潘恩著  
馬清槐譯

商務印書館  
1959年·北京

THOMAS PAINÉ  
COMMON SENSE

本文根据美国纽约 G. P. Putnam's Sons 图书公司 1894 年出版的由 M. D. Conway 编纂的 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É 第一卷译出

本書作者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ine, 1737—1809) 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美国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的最激进的代表。潘恩生长在英国，为穷困所迫，于 1774 年迁居到北美洲，不久就投入了殖民地争取独立斗争的行列中。《常識》是他到北美洲后发表的第一篇政論。在这篇政論中，他猛烈抨击了英王政府的暴政，坚决主张美利坚独立，并倡导建立共和政体。这篇政論是英国殖民地为脱离宗主国、谋求独立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它不仅在当时起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鮮明的現實意义。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和本書的內容，譯者又从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托馬斯·潘恩选集》中譯出序言《托馬斯·潘恩》一文，一并供讀者研究参考。

常 識

[美]潘恩著 馬清流譯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字第 107 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宣武裝訂厂裝訂

統一書號:11617·91

1959 年 11 月初版 开本 787×1092 1/16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5 千字

印数 2—~~10~~ / 10 括頁 1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9) 0.32 元



托馬斯·潘恩

## 目 次

[苏联]巴斯金教授：托馬斯·潘恩.....	1
常 識 .....	21
泛論政權的起源和目的，并簡評英國政體.....	21
論君主政體和世襲 .....	27
對北美目前形勢的意見 .....	37
論北美目前的能力：附帶談一些雜感.....	56
附 記 .....	67

# 托馬斯·潘恩

〔苏联〕巴斯金教授

十八世紀末美國資產階級革命，把好多杰出的社會活動家推上了歷史舞台，他們不但在祖國，而且在其他的國家也是頗負盛名的。在這些人中間，就有啟蒙學者托馬斯·潘恩，他是富蘭克林的戰友，寫過許多批判封建教會的世界觀的作品。

托·潘恩於 1737 年生在英國。他在那裡第一次困於貧厄，並且由於自己的激進的政治見解，遭到官方的迫害。1774 年，潘恩到北美去“尋求幸福”。在新的祖國，他很快地成為反對英國殖民者的革命鬥爭的一個參加者。他在 1776 年 1 月發表的作品《常識》，乃是號召北美人民起來參加正義戰爭以反對英國君主政體、爭取自由與獨立的警鐘。列寧曾把這次戰爭評價為反對壓迫者的真正解放戰爭。甚至美國革命的比較溫和的領袖們，都認為《常識》是宣傳建立獨立的北美共和國的思想的支柱。革命運動的比較激進的代表人物，則把潘恩的這個作品理解為論証必須消滅全世界封建專制的共和宣言。

潘恩在參加獨立戰爭（1776—1783 年）時，用槍杆和筆杆幫助北美革命軍隊把自己的國家從侵佔者的手中解放出來。他以《北美危機》這一總題目有系統地發表了一些小冊子，在北美軍隊中人們把這些小冊子看作是戰鬥的命令。

潘恩在這些小冊子中表現了自己的出色的文學才能、善于把啟蒙思想貫輸進群眾的意識的本領，以及自己的真正革命的

气概。就这一点來說，他远远地超过美国其他的启蒙学者和革命参加者，其中包括比較平和、比較审慎的富兰克林。

战争結束以后，潘恩回到欧洲。他在那里也积极参加了反对封建專制的革命斗争。1792年，他被选入法国的国民議會，并被称頌为北美的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在英法知識界的先进的、带有启蒙情緒的代表人物中間，他的《人权》(1791—1792)一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是为了保衛1789年法国资產阶级革命的原则、反对革命敌人爱德蒙·柏克而写的。

1794年，潘恩写了一本很重要的哲学著作《理性时代》，这本书所起的重大作用，几乎可以同十八世紀法国最杰出的无神論者的許多无神論的小册子相提并論。

最后，在1797年，潘恩写了一个目的在于反对英国教会人士的作品《土地的正义》，提出了一系列經濟問題，特別是“不公平的”財产分配的問題。这本书在法国革命的小資产阶级活动中間掀起了热情，可是法国和美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却对它保持着警惕。潘恩从那些思想家方面获得了“不安分的”、“危險的”人物的名声，說他威胁着重建起来的資产阶级共和国的幸福。

但是，潘恩虽然主張激进主义，却在法国采取了不正确的政治立場。他同雅各宾党发生了冲突，开始反对革命的恐怖手段，贊成雅各宾党与吉倫特党言归于好。1793年底，法国的革命政府把潘恩监禁起来。这位美国的启蒙学者在獄中写成了他的《理性时代》的第二部分。然而，随着罗伯斯庇尔的死亡而恢复自由以后，潘恩断然地譴責了获得胜利的热月党分子，繼續宣傳自己以前的激进共和观点、一貫对于世俗和教会封建主的憎恨，

并公开和法国反动派发生冲突。

1802年，潘恩回到美国，可是在那里的已經获得胜利的美国资产阶级当权阶层中間，他也得不到支持。潘恩的哲学观点，他对人民主权的坚强信心，使他不能为“美国生活方式”、即美国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关系所接受；而在那种关系下，根据恩格斯的精辟的說法，“人权中的主要权利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sup>④</sup> 虽然托馬斯·潘恩并不打算消灭这种权利，他毕竟敢于批判大私有制和大私有者，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资产阶级对他本人和他的作品的仇恨了。

潘恩于1809年逝世，在他生前始終沒有得到美国官方人士的好評。甚至到現在，美国资产阶级还千方百計地想抹煞他死后的声名。但同时潘恩的著作却至今还引起很大的兴趣。它們在美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最光輝的一頁。

在許多理論問題方面，潘恩比不上法国、德国甚至美国的启蒙学者。与自己的同胞和朋友富兰克林不同，他并不是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但是，他为了把哲学和社会学問題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当前任务联系起来而作的不倦的努力，他对封建專制的不調和性，他那彻底的共和主义，使这个美国的启蒙学者成为“旧制度”的一位最激烈的反对者。十八世紀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绝大部分都囁嚅于“开明的君王”、“自上而下的”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进步思想的和平宣傳。潘恩公开地声明，他的启蒙活动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引起的。他把自己看作是先进队伍的一名战士，看作是为呻吟于外国奴役者束縛下的被压迫国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四卷，第18页。

家爭取民族独立的爱国志士。

在战胜了英国军队并在北美建立了独立国家以后，潘恩写了他的第十三本小册子《美国的危机》，他在这本总结性的小册子中写道：“为北美的事业所作的斗争使我变成一个作家。这个事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打动我的理智；据我看来，人们由于希望同那些决心想要征服这个国家的人实行不可能的、反常的和解，不走那个可以巩固和拯救它的唯一道路，即独立宣言的道路，因而已经使它处于危险的境地，——所有这一切使我不能保持缄默。如果在七年多的期间内我曾对它有何贡献，那么，由于我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自由地、无私地运用了笔墨，由于我显示出不必卖身投靠也可以有所创作，我也曾有助于提高文学的美名。”<sup>①</sup>

在这几行真正充满了革命热情的出色句子中，潘恩仿佛是在同他那些把文学活动和当前革命斗争对立起来的启蒙运动朋友们的传统辩论似的。他把自己看作是受革命思想陶冶的、使自己的理论工作从属于当前迫切问题的革命的儿子。他同样坚决地反对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根本的革命任务。潘恩的同时代人——德国的启蒙学者——蓄意迁就德国丑恶的现实，因而脱离了对封建专制的直接政治斗争，鑽进了美学理想的王国，或者至多只限于从伦理上批评封建主义；可是在这个时候，潘恩却把迁就美国人民之敌的想法称为“不可能的和反常的”。他严厉地谴责了甚至为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代优秀代表人物所特有的对于奖励文艺的贵族所提供的物质援助的态度，并

---

① 《托马斯·潘恩选集》，俄译本，第174页。

号召一切珍視文学名譽的人們在人类偉大的解放斗争中自由地、无私地运用自己的才能。他的要求創作而反对卖身投靠的号召，切中要害地打击了現代资产阶级的帮閑文人。

就在这第十三本小册子里，潘恩所发表的卓越的思想，甚至大大地超过了启蒙运动最先进的思想；他認為对于群众的真正的启发，不是发生在革命之前，而是发生在革命之后。他引証了美国革命的經驗，因为它“比人类其他任何事件更为重大”，有助于在人类中間傳播爱好自由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也認為美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这足以証明《美国的危机》的作者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是目光十分远大的。难怪馬克思指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推动了十八世紀欧洲的革命”。<sup>①</sup>

可惜，潘恩由于自己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沒有发揚出关于对人民群众的启蒙工作必須以社会关系为轉移的思想，也沒有闡明一国的革命运动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影响問題。他不能彻底理解美国革命本身的资产阶级性質，而这个革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导致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方式在美国的最后确立，导致了以其法律保障资本家有权統治广大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成。

潘恩作为启蒙学者，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个出色的条理分明的人，异常严谨地、透彻地闡述自己的思想，并以明显的、容易了解的例子証明自己理論上的論点。他坚决反对任何含糊其詞的表达方式。因此，連西欧許多最杰出的启蒙学者的作品，也往往引起各种不同的甚或矛盾的解釋，而对于潘恩所闡明的意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第一編，第21頁。

見，却很难加以爭辯。他有很多敵人尖銳地反駁他的世界觀。他的主張獲得“第三等級”激進代表人物的擁護，可是他的朋友也好，他的敵人也好，誰也不能反駁他的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傾向，誰也不能不看到他一貫地對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封建等級傳統所作的鬥爭。

潘恩對於自己的哲學觀點，沒有象對於社會學觀點那樣作比較詳細的說明，但是即使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也能夠提出不少卓越的原理。雖然他還沒有達到公開的無神論的地步，可是在反宗教的宣傳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

潘恩相當注意道德的問題。他和富蘭克林一樣，認為基本的任務是把道德規範從教會的監護下解放出來，並且他在這個方面甚至比富蘭克林更加強調神學對倫理學的不良影響。作為道德家，潘恩與其說是接近富蘭克林，還不如說是更接近愛爾維修和狄德羅。

象伏爾泰、富蘭克林和其他許多啟蒙學者一樣，潘恩正式宣布自己是個自然神論者。他承認上帝是造物主。在《理性時代》中，潘恩一开始就以固有的直率態度聲明說：“我相信唯一的上帝，指望着超出塵世範圍以外的幸福。”<sup>①</sup>可是，如果仔細加以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上帝同自然界中或人類社會中所進行的任何過程沒有聯繫。在這位美國的啟蒙學者看來，甚至上帝的作用為宇宙創造者的作用，與其說是確凿的事實，還不如說是一種假設。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嘲笑宗教的關於創造世界的傳說。潘恩對於來世的生活抱有更大的懷疑。他在說到“超出塵世范

<sup>①</sup> 《托馬斯·潘恩選集》，俄譯本，第247頁。

圈以外的幸福”时使用“指望”这个詞，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那篇哲学論文的全盤思想在于証明，人类不应当依靠信仰或希望，而是应当依靠知識，即指望于真实的事實；可是潘恩認為，沒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一个事實足以証明上帝或“超自然的”世界是存在的。所以他的自然神論的見解可能帶有純粹道德的思想。

法国战斗的无神論者看出宗教道德在原則上是与真正的德行积不相容的，潘恩却和他們不同，他相信对于上帝的信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人們之間的友好关系。所以他象德国的萊辛或赫德爾一样，把上帝的意象同人类道德上的自我改善联系起来。在他的《理性时代》这本书里，專門有一章討論“为上帝服务的最好办法”，他在这一章里用各种合乎邏輯的論據使讀者相信，“我們能够具有的为上帝服务的唯一觀念，是促进生物的幸福的觀念……”<sup>①</sup> 他指出，宗教应当摆脱一切神秘性，因为它正就是人人所應該担负的道德責任。

为了更具体地強調他的哲学的唯物主义傾向，潘恩以自己哲学論文的大量篇幅，闡明了一切在世間發生的自然現象以及原則上不可能有任何“奇迹”的問題。也象英國十七世紀唯物主义者霍布士一样，他認為关于来世的想法只有在不健康的人的头脑里才会产生。潘恩反对两个彼此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并且同样不正确的概念——“神秘”和奇迹。他指出，前者力图使理智发生混乱，而后者力图使感覺迷惘起来。所以潘恩憤慨地認定神秘是“謠語”，奇迹是“戏法”。我們常常把每一种生疏的現象叫

---

① 《托馬斯·潘恩选集》，俄譯本，第227頁。

做奇迹。在我們看来，有为数很多的事物，同我們所习惯的寻常的瑣細事物相比，是不可思議的。“象虽然体格龐大，”潘恩肯定地說，“它同瓢蟲比起来却并不是个更大的奇迹；高山同原子比起来并不是个更大的奇迹。”<sup>①</sup>

潘恩以唯物主义的精神直率地說，自然界存在着一定的活動規律，而奇迹总是与这些規律的作用相对立的。因此，如果相信奇迹，乃是完全荒謬的，并且是与現實相抵触的。这位美国的启蒙学者預言人們象鳥一样飞行的时期即将来。他发表意見說，現在这似乎是个奇妙的事情，但是在鳥类的飞行或将来人类的飞行方面，是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認識了自然及其規律以后，我們就会知道这并不是“奇事”。“如果我們不知道生命可以暫時停止，而不是完全消失，”潘恩說，“那么，看来象是死人的一些人的复活，正如淹死的人时常会发生的那种复活，也就是奇迹了。”<sup>②</sup>

潘恩得出結論，对奇迹深信不疑，給一切宗教帶來原則上的損害，因为这把上帝贬低到表演各种戏法以期逗人发笑、使他們瞠目結舌的魔术师的地位。在分析了关于吞下約拿的那条大鯨的宗教傳說以后，潘恩諷刺地說，如果約拿吞下了大鯨，那么这种相反的情况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奇迹了。潘恩写道，“奇迹”中間最特別的，是講到魔鬼的福音故事，彷彿魔鬼把耶穌帶上了一座最高的山的頂峰，帶上了一座最高的庙堂的圓屋頂，从那里将世上的万国指給他看。<sup>③</sup>这位启蒙学者譏諷地問道，当时魔

① 《托馬斯·潘恩选集》，俄譯本，第288頁。

② 同上。

③ 見《馬太福音》第四章，第5—8节。——譯者

鬼怎么会沒有發現美洲呢？“还是这位幽暗的殿下只注意那些王国呢？”<sup>①</sup>

托馬斯·潘恩的所有这些議論，很象霍尔巴赫的斗志昂揚的无神論的作品。如果考慮到潘恩表达自己意見的对象，首先是大都怀有宗教偏見并往往积极参加宗派組織的普通美国讀者，那就应当特別欽佩美国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的勇敢和胆量。托馬斯·潘恩虽然有他的自然神論的見解，却可以称为美国土地上唯物主义和反宗教傳統的首創者之一。美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民主和进步的一切敌人，都反对这个傳統，过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大部分的启蒙学者多半只从事反教权的宣传。引起爭論的，不是神学的教条，而是神职人員应用教条的方法，不是对耶稣的信仰，而是天主教或其他教会团体对这种信仰的曲解。况且，人們把早期的基督教理想化了，把它同后世的“腐敗的”基督教对立起来。在萊辛的著名的启蒙剧《聪明的納坦》里，貫彻着这样的思想：所有一切宗教和教会，只要它們能促进博爱，都是好的。托馬斯·潘恩却站在一个比較激进的立場上。他大声疾呼地說：“我不相信犹太教、罗馬教、希腊教、土耳其教、新教等教派或我不知道的其他任何教派所信奉的宗教。我个人的智慧就是我的教派。据我看来，一切国教的制度，不論是犹太教、基督教或土耳其教，都不外乎是人虛构出来的东西，其使命在于吓唬和奴役人类，独占政权和收入。”<sup>②</sup>

上面所援引的几句話使我們想起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

---

① 《托馬斯·潘恩选集》，俄譯本，第290頁。

② 同上，第247頁。

无论是否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富兰克林或其他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绝对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反宗教的言论。

潘恩认为，在未来社会中，随着“政体的革命”而来的，将是宗教制度的革命，这一思想甚至显得格外卓越。从那与人民群众的愚昧有关的反动政权和社会阶层对宗教团体所表示的支持方面，他看出了宗教团体的力量。潘恩认为，人们关于人生的错误的概念是由于一系列社会条件而形成的。这些条件的改变必然也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导致科学的胜利。他在《理性时代》中尖锐地批判了神学方面的书籍，指出了它们是不合逻辑的、缺乏根据的。造出这些书来的，并不是上帝及其先知，而是人们，并且照例是不学无术的或显然对虚妄深感兴趣的人们。潘恩特别大胆地批判了基督教的当局。

“……自命为教派的各基督教神话创造者，造出了自己的远非古代神话所能比拟的虚构的、妄诞的和荒唐的故事。

“古代的神话创造者叙述：巨人群起来反对丘比德，有一个巨人一下子翻过几百座峭壁向他扑去；丘比德用雷霆打败了他，然后把他放在埃特纳山的内部，因此，每逢那个巨人翻一个身，埃特纳山就会喷出火来。显然，这里火山引起了这个神话的想法，而神话之所以作这样的构思，其目的就是要符合这种情况。

“基督教的神话创造者告诉我们，他们的撒但起来反对全能的上帝，上帝战胜了他，不是把他幽禁在山的内部，而是把他幽禁在无底的深渊里。不难理解，第一个虚构引起了这第二个虚构的想法，因为关于丘比德和巨人的神话已经讲述了几百年，才出现关于撒但的神话的。

“到目前为止，古代和基督教的神话创造者彼此还没有多大

不同。”<sup>①</sup>

潘恩必須对基督教的宗教書籍作詳尽的分析，首先是为了要證明，基督教不是天启的宗教，它也象其他的宗教一样，有它自己的历史，即有它自己的开始，因而也有它自己的終結。所有这一切給了潘恩关于未来社会是无宗教社会或至少是沒有任何教会或宗教組織的社会这一論題以充分的理由。固然，作为自然神論者的潘恩，認為对于上帝的信仰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始終是存在的，但这首先是理性的抽象的宗教，或者是既无权力又无智力的精神上的上帝的宗教，对于这个上帝人們是不应当受其支配的。

潘恩把宗教同科学对立起来，把信仰和希望同人們的理智对立起来，从而发展了唯物主义認識論的原理。他肯定地說，人們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觀念和概念，連最复杂的包括在內，都反映着自然、它的联系和关系。他批判了客觀唯心主义，因为它硬說科学的原則是人們人为地創造出来的，具有条件的、随机应变的意义。潘恩完全以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的精神說：“人不会創造这些原則；他只会发现它們。”<sup>②</sup> 認为自然的客觀規律是人造出来的一——这在他看来就等于是走上比單純的愚昧无知更坏的道路。天文学研究天体的真实的运动，三角学研究三角形的真实的性質，几何学研究图形的实际的构造。如果沒有客觀的过程，也就沒有这些科学，沒有任何科学的概念。潘恩繼利奧納多·达·芬奇之后，頌揚了人类的視覺的力量，由于有这种力量人們才能看見“巨大的宇宙”。由此可見，他承認感性認識的巨大意

① 《托馬斯·潘恩选集》，俄譯本，第252頁。

② 同上，第269頁。

义，但同时把感性認識看作走向理性認識的一个阶段。

潘恩沒有越出形而上学的和机械的唯物主义的范围。他对于理性的了解本身带有抽象的、反历史的性质。归根到底，他的《理性时代》也象资产阶级其他启蒙学者的想法一样，——这是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已經找不到封建等级的制度和见解。他的上議院的战友美国启蒙学者伊頓·艾倫(1737—1789年)宣称，“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神諭。”在理性的标志下，孜孜不倦的伏尔泰在法国的土壤上崭露头角了。

启蒙哲学家們所宣布的对于理性的崇拜，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反对封建“愚昧”的斗争中却起着异常重大的作用。它就是在現在听起来，也象是对那些绝大部分站在非理性主义立場上的帝国主义时代反动哲学家的起诉書。正因为如此，在潘恩在那里生活和奋斗过的国家里，他的哲学遭到诅咒。可是，在人类的理智战胜了愚昧和迷信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潘恩的著作也象其他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一样，却成为十分仔細的研究的对象。

但是潘恩不仅是作为哲学家而名载文化史册的。他的社会政治著述具有更大的意义。许多启蒙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局限于发表一些抽象的邏輯上的議論，或指出一些历史上偶然的例証和实例，潘恩却与此不同，他所抱定的目标是从理論上分析他当时的时代。由于直接参加过美国和法国的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他認為这些革命的經驗是其他各国的榜样。就连拥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启蒙学者們，都認為这种革命在德国的条件下是不适合的。他們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面前的恐惧心理。潘恩根据美国革命的經驗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沒有